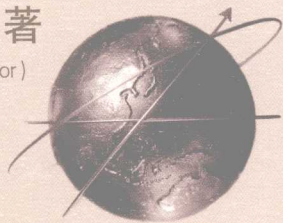


组织社会学 与决策分析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y Analysis

李友梅 著

Li Youmei (Author)



◎ 上海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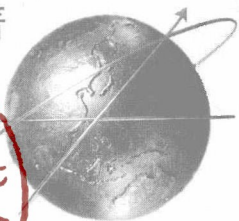
●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组织社会学 与决策分析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y Analysis

李友梅 著

Li Youmei (Author)



◎ 上海大学出版社

●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 / 李友梅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1118-015-2

I. 组… II. 李… III. 组织社会学—研究 IV. C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0137 号

责任编辑 杨 华 封面设计 张天志 技术编辑 金 鑫

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

李友梅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5 字数 228 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600

ISBN 978-7-81118-015-2/C·069 定价: 32.00 元

引言

科学最初是与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支持——只有在某些类型的社会中,科学才能兴旺发达,反之,科学就没有持续的和旺盛的发展和应用,这样一种社会也不能正常运行。^① 科学是在求解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答案,它总是依赖于它所隶属的那个社会总体的发展状态。这种关联在社会学领域更为突出,因为社会学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各种社会群体在社会演变中碰到的不明确的和难以解决的问题。^② 社会学研究者从自己的实践经验里得知社会现实的本质构造比我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能够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其实,社会学作为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的方法,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更容易受到既定社会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影响。组织社会学也不例外,它在近 80 年中不断取得重大发展,这个发展既反映了社会学家试图解释清楚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集体行动而非个体行为,同时也印证了组织社会学在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中发现了与自己同步成长的身影:现代复杂社会中的组织现象的日益增长。

组织现象始于一种合作:个体为了实现某个既定的共同目标而必须使自己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得以达成合力的行为模式。基于这种合作的群体必须以分工形式确立任务,为了能够协调不同的任务,人们需要建立相应的措施和执行这些措施的制度保证。可以说,这样的组织模式是为解决集体行动的诸种问题而构建的,因而不是自然而然的。从比较初级的层面看,当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在着手办理某事时,总会感到有组织和安排人员的必要。于是,组织成了人们进行集体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但这种手段的使用在行动策略上却趋向于使相关参与者的行为与某种秩序相适应。其实,每一个与

① T·帕森斯著,《社会科学:一种基本的国家资源》,未发表的手稿,1949(转引自巴伯著,顾昕等译,《科学与社会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1,第71—72页)。

② E·Friedberg, *L'analyse sociologique des organisations*, p. 11, revue POUR, N°28, réd. 1973.

社会打交道的个体,不管其愿意与否,或多或少都会与一些组织有联系(比如一个个体同时既是企业工程师,又是其职业工会的会员、某体育协会的会员、某政党的成员等),处于这些联系中的个体有时还被牵扯到其他一些关系中。因此,人们不仅会觉得组织的无所不在,而且还感到组织涉及了日常生活的广泛领域并以各种方式在运作。正是鉴于此,组织社会学家有必要去观察有组织的行动如何才能有可能实现,去分析组织策略是怎么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

组织概念受到广泛讨论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大工业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公共官僚机构对政策变化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企业组织在形式上的理性化需要和工程师的唯科学主义愿望,这给组织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带来了机遇。20世纪初的30年中形成的众多关于企业劳动组织、企业行政职能以及公共行政机构的权力等方面的重要管理思想,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看,其中最出名最有影响力的有F·泰罗(F·W·Taylor)的劳动科学组织、H·法约尔(H·Fayol)的企业行政职能和M·韦伯(M·Weber)的理想型科层制行政领导。他们的研究虽然针对企业组织不同层面上问题,但基于他们的研究而形成的组织管理理论都十分重视加强形式制度的约束,并试图通过严格的规章在组织中进行整顿。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个新的思潮,即以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为研究领域的学派开始露出。经过20多年的调查研究和实验发现而形成的这个学派,其理论成果在50年代里相继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E·梅约(E·Mayo)关于非正式群体行为在正式组织中作用的分析。同时出现的重要思想有D·麦克乔治(D·McGregor)有关寻求组织目标与不同行动者目标之间更好调解的观点和A·马斯诺(A·Maslow)的“需要层次论”。由此引发了组织研究对人类动机复杂性的极大兴趣和对心理学的方法论倾向。带有这些兴趣和倾向的研究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达到了鼎盛时期,但那些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又回到了马斯诺(A·Maslow)的“需要层次论”。^①由K·利维(K·Lewin)等社会学家基于30年代末期开始的涉及社会影响、权威和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结论:就群体的效力而言,民主型胜于放任自由型或自治型。这个研究成果引导着人们去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领导方式在这些情境里产生效力,而在另一些情境里却不发生效力。^②也就是说,人们将把注意

① 参阅米歇尔·克罗奇耶、埃哈尔·费埃德贝格著,张月译《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② Jean-Claude·Ruano-Borbalean: Un siècle de réflexion sur les organisations, *Sciences Humaines-Hors série*, No20, 1998, p. 6-8.

力更加集中到组织结构之间的联系以及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随之,出现了围绕组织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来源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还导致了对韦伯科层理论的深刻反思。

组织现象的进一步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法国显得特别出众,该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组织社会学所创始人M·克罗奇耶(M·Crozier)及其领导的科研小组,通过他们在法国本土的个案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曰组织社会学的决策分析说。作为这个研究范式的学术轨迹,起步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组织理论,十年后克罗奇耶及其科研小组就已经认为,他们所获的研究成果能够与美国人所主导的量化分析模型相媲美。就学术传承来看,在较早的组织研究领域,存在两种起始点:墨顿-古尔德纳-塞尔兹尼克类型的社会学模式,以及密歇根学派的社会心理学模式。^①而60年代中期在法国兴起的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与美国组织社会学制度学派一样,在50年代中期都共享了西蒙、马奇(J. G. March)和奥尔森(J. P. Olson)早期的研究成果。但隔了十年,这两个学派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兴趣。相比较而言,制度学派更趋于关注广为接受的观念和制度对行动者行为的约束,而决策分析学派更趋于关注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即,超越或利用组织约束的策略)以及制定行动策略时所基于的思想方式和实行动策略所使用的手段。

法国组织社会学的早期重要成果中有M·克罗奇耶(M·Crozier)著的《官僚主义现象》^②以及他与E·费埃德贝格(E·Friedberg)合著的《行动者与体系》。^③这些成果向人们展示关于行动者和体系之间关系的一种推论方式:当行动者游离于系统之外时,这个行动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行动者的自由范围及其行动的合法性正是由系统设计的。而系统只有通过行动者才可能存在,因为行动者是唯一能成为系统的支撑者,是唯一能赋予系统生命,并且能让系统发生变化的因素。概言之,是行动者建构了系统,而系统又约束着行动者。由此,克罗奇耶和费埃德贝格进一步阐明了行动者所支配着的一种自由余地,并在既定情境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性或一种权力。每个行动者都有必要制定其个人的决策,这种决策行为的目的在于增加他的影响力,其思维方式取决于他的价值标准、他对形势的领悟和他掌握的势力手段。克罗奇耶和费埃德贝格还指出,在人类关系和社会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权

① 参阅米歇尔·克罗奇耶、埃哈尔·费埃德贝格著,张月译《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英文版序,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② Michel·Crozier, *Le phénomène bureaucratique*, Editions du Seuil, 1963.

③ Michel·Crozier et E·Friedberg, *L'acteur et le système*, Editions du Seuil, 1977.

力关系。当集体行动的结果与行动者所希望的结果之间发生不一致,这始终都是人类行动领域的建构,而这种建构的促成正是组织抑或系统特征的体现。^① 费埃德贝格在其《权力与规则》^②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组织这个术语既表示一种状态又是一种动力。

人们不难看出,组织社会学家对于组织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经历了长期的深入研究逐渐形成的。由此,人们也可以发现,随着工业化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组织的特征不断被再造,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种变化其实还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越来越多的问题或活动离开私人领域而变成“社会化的”,或者说,问题解决或活动组织的责任越来越由专门机构以集体的方式承担了。由于这种转移,组织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组织随着其自身的变化更加复杂化了。实际上,组织为了适应社会对它们要求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或者说,组织为了满足社会对它们的要求,就必须使自己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教育机构要想在人们的活动快速社会化的情况下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实现自身的目标,就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单一教学大纲。它们不仅要更新教育内容,而且要使教育内容更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们的不同公众(青年人或成年人,执行者或领导者,农民或市民等)从它们那里得到满意。

正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当自己着手办理某事时总会感到有组织和安排人员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成了集体活动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管其愿意与否,都会从属于一些组织(比如一个个个体既是企业的工程师,又是其职业工会的会员、某体育协会的成员、某政党的党员等)。组织无所不在,并以多种方式运作,而且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最广泛的领域。因为这样,社会学家有必要去观察、分析组织是怎么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的。回顾组织社会学研究发展过程,人们最早发现的组织是有一定的结构和有规定的角色,其成员的行动自由是受到限制的。随后,人们注意到组织不是中立的,组织如同一种过滤器,有可能放过某些创新行为,也就是说,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行动自由实际上有可能不被完全限制的。然而,这些发现在此时并没有使研究者认识到心理分析的局限性,他们在对组织生活中的个体行为进行分析时,仍然习惯于使用心理学的术语(如个性、情感等),或者根据阶级划分的条件(如社会来源、社会结构等)来推论。关于这种

^① 参阅米歇尔·克罗奇耶、埃哈尔·费埃德贝格著,张月译《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② E·Friedberg, *Le pouvoir et la Règle*, Editions du Seuil, 1993.

不足的反思性研究使组织社会学家进而提出：如果研究能够深入到某个中介层，那么就有可能再掌握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也是限制组织成员行动自由的重要因素。根据克罗奇耶和费埃德贝格的分析，组织一方面倾向于尽可能精确地规定每个成员的任务、职位、特权及其应该作出的贡献，这些规定使个体很难扩展自己的行动范围，因而只能克制他的创造性；另一方面，组织以其特有的调节方式和非中立的评判标准支配着能迫使其不同等级层的成员接受一种富有灵活性的逻辑，结果造成了能够影响其成员的关系、决策和行动方向的社会体系。

尽管组织具有如此的制约特征，那些坚信大企业快速发展如同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思想家们，依然为这些大企业中存在的因循守旧、例行公事、步调统一、无个性等问题感到震惊。因此，出现了一种极端悲观主义的思潮，比如“组织的人”、“灰色的人”、“大众社会”等观点被提出来。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悲观看法，是因为他们更多地看到了大企业的权力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精英的手里，即“管理学家”和大组织上层的“高级专家”将不断替代每个成员对国家事务的民主参与。一些社会学家以夸张的语言对这种看法作出这样的归纳：最终结果是个体及其自由意志会在无个性的规则世界里迅速消失，社会将在官僚主义模子里构建而趋于均质。

费埃德贝格在其《权力与规则》的导论中指出，现实中的人类关系和社会交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始终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而这个整体的被组织程度取决于一系列的经验机制，世界得以获得稳定性恰恰是借助于这一系列经验机制，并允许各方参与者的创新力量、行动和行为建构起必要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关系的建构方式因组织和环境而异。这种协作的建构构成了每个组织、每个集体行动必须予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的原动力往往来自行动领域的构造和再构造，组织现象的发生可以看作是在这些构造和再构造过程中的一种偶然结果。由此而论，组织既是一种载体，又是载体中的容器；既是结构，又是过程；既是对人类行为的制约，又是人类行为的产物。组织是人类集体行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组织的存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具有深刻的含义。^①

基于决策分析的研究发现，实际上个体从来不只是属于一个组织，他在其社会生活中有多方面的责任、多种从属或多个效忠，他的行为因此不会只受限于一个组织的制约。个体可以在多处承担角色（比如企业的工程师、工

① E·Friedberg, *Le pouvoir et la Règle*, Editions du Seuil, 1993.

会干部、体育协会的会员等身份),并可以根据具体需要使其身份发生变化。总之,个体能够根据他在一定时期内希望达到的和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这些角色中分配自己的资源投入。也就是说,个体能够试图为自己确定某些活动领域,以便既能够在其中行使他的角色,又能够使他的角色与组织一起运行。正是由此,一些试图限定组织总体的结构和运行的一些“游戏”被建立起来,围绕这些游戏的一种平衡也会随之而形成。

组织构成了制约,个体在组织内的行为只要是具有组织的特征,它就无法单独地展开,换言之,具有组织特征的个体行为必然是集体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是组织成员行为的真正困难所在。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一些个体经过学校培训后返回到企业或机构,他们很快就恢复了或更确切地说又服从了他们过去的行为方式。有研究发现,这里的问题往往不是出自教育,而是由于这些企业或机构缺乏结构性的变化,是这些企业或机构固有的运行逻辑或曰“游戏规则”,在阻碍作为其成员的个体对新知识运用的缘故。这种阻碍的存在成为一些组织社会学家去了解它是以何种方式被实施的理由。其实,本书试图展示的正是这些组织社会学家是怎样实现这个了解的,或许,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我国组织社会学研究者需要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我们在本书中将首先介绍组织社会学成长的经济社会背景,随后以欧洲大陆的相关研究为聚焦点,阐述组织社会学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及作为决策分析的基本概念工具。虽然前面已经摆出了“组织现象”,但我们还将再以简单方式对“组织现象”的初始形态作一勾勒,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读者更快地适应我们的语境。

从日常工作的经验出发,我们或许都知道组织是什么。不过,我们最先会想到的可能是那些根据明确规定的目标(物质的生产、信息的传递、利润的实现)组建的团体,它们既有一系列能保证自身目标实现的手段(包括人的手段),同时又受约于强制性的控制程序。这样的团体指的是工厂或行政机构,它们对每个成员的工作任务进行具体分工并有专业性分配,对每个成员的职权等级有明确的限定,并要求不同工作岗位之间因必须的交往而形成的关系体系与已定的规章制度相吻合。实际上,在这个存在许多正式制约的“被组织的”领域里,人们还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明言的制约,这些制约来自于另一种领域:组织成员在其中可以行使自己自由的活动的空间。但决策分析指出,就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言,这两种领域之间没有可以连续使用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现象不是仅存在于组织自身内部的,而且是更扩散更普遍的。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组织现象产生所需要的条件,组织社会学家经常列举一个伙伴群体决定一次活动的例子。该伙伴群体在活动的决定刚作出时,其成员因为彼此比较了解而没有提出过多的问题;他们之间情投意合,对将要进行的活动内容和意义有很默契的赞同。所以,在活动开始时,群体中的互相协调不需要通过解释就能形成,每个人晓得自己要做的事情,也熟悉别人的角色期待。此时,人们还不能说该群体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最多只能说它是一个由友谊关系和共同目标结合在一起的“非正式小组”。但人们可以认为这个“非正式小组”已经存在了组织的雏形。其实,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个群体的成员共同分担了任务,每个成员拥有的知识、资源和促使成功的手段必然使他们各自的贡献趋于专业化。他们的角色之间不是严格等同的,而一定的威信等级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或一些领导权威被大家所接受,而且不明言地承担着指挥和协调小组活动的职责。因此,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活动,对于小组成员而言,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约束,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小组成员的互相行为。由此看来,一个正式组织所具有的轮廓基本出来了。

既然这个伙伴群体的活动还在继续,其成员的行为还是协调的,共同目标在每个成员那里是内在化的,而且或多或少是自发地使自己的行为与共同的目标相适应的,那么它的组织轮廓就是暗含的和非形式化的。不过,这种局面一般不会延续很长的时间,因为只要这个群体的目的和行动所基于的统一稍微有些紧张或冲突(更具体地说,一旦该群体的人数有所增加),那么群体要维持其原来的协调一致就会碰到困难,它的运行就不能再基于原来那个暗含的结构,它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有可能变得复杂起来。这时,该群体就会自问:怎么办?为什么要这样做?怎么去做?因此,群体的成员就需要解释了,在解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两种局面:或者是解散小组,宣告结束;或者小组维持下去,但维持下去的这个小组必须拿出办法,以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危机。也就是说,这个群体的协调要在理性和自觉的基础上来建立,而与这个协调相关的人必须是那些要为实现由此达成的组织目标而尽力的人。

上述例子显示了一个形式组织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它们可以被概括为:明确的角色和任务的分配;职权等级体系,其功能是保证使每个成员的行为与组织目标相符合;交往体系,它是不同成员之间互相从属关系的体现;目标准则,它们是用于评估和检查组织的成果以及在组织中竞争的个体所获得的成果。以某种方式说,这个伙伴群体经历了一场危机,由于这场危机,引起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首先,使得小组成员的行为和小组总体的前途具有可预

见性；其次，在使检查已期待和已规定的成果成为可能的同时，使小组的运行得以调节；最后，建立明确的组织机构和制订一系列规定每个成员的任务及其执行办法的内部制度。由此开始，这个伙伴群体的成员才可以合法地自称是组织成员，他们的任务和办法已经变成形式化了，而且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因此，组织分析首先在于研究人类的集体行动自身所需要的条件，并试图摸清我们中的每个人为了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必须使自己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达成合作时所碰到的那些制约。^①

可以说，法国组织社会学的决策分析注重个案式的定性研究，并使用归纳式的推论方式，其思考的出发点是组织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决策分析所基于的实地调查，如同E·巴比(E·Babbie)所说的是展开归纳逻辑推理的用武之地，是在自然情境下直接观察社会现象的一种社会研究方法。^② 本书将使读者了解组织社会学的决策分析所关注的学术“田野”，读者由此可以发现决策分析试图研究的组织不是一种稳定的结构，而是复杂社会条件下人类合作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不平衡的交换与协商关系，权力在其中成为行动者的工具，等等。简言之，组织社会学的决策分析致力于发现的是集体行动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组织生活的深层来源。

最后，我要在引言中加以说明的是，组织现象是人类社会中受到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现象。正因为此，许多学科，比如：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人类学，在漫长的学术研究和积累过程中，都不乏从自己的角度对组织现象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是多维度的，但各有侧重点，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流派。孔兹(Koontz)在研究组织理论脉络时曾颇有感触地说“组织理论是一个语义的‘丛林’”。各个学科对组织现象的分析与反思往往反映出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理论是一个汇聚了众多视角的学术“田野”。本书主要介绍法国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学派的理论脉络，向读者展现出这个学术田野中的一种研究思路。

^① E·Friedberg, *L'analyse sociologique des organisations*, p. 15 - 17, revue POUR, No28, réd. 1973.

^② [美] 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11章，华夏出版社，2000年。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组织的复杂化与组织研究的演进

一、大工业组织的发展	1
1. 动因之一：引导或影响变化趋势	2
2. 动因之二：保留或重建自主空间	7
资本积累	8
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诞生	10
个体和理性的成功	14
二、组织作用的发现	18
1. 组织：个体实施其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	19
2. 组织：工业社会可动员的基本单位	21
3. 组织：调整关系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26
三、组织研究的演进	31
1. “手”的超越与劳动科学组织原理	31
2. “心”与人际关系学说	36
3. “头”与决策分析	45

第二章 组织社会学的成长历程

一、从组织生活的具体问题出发	58
1. 科层制现象的理论之争	60
重视现代科层制的理性化形式	63
强调科层制组织的反功能	66

2. 相关的经验研究	68
案例 1: 工业企业领导方式的变化	69
案例 2: 公共机构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	72
案例 3: 围绕两个公共部门里的规则 组建的游戏	73
二、组织的再构	77
1. 组织与社会体系	77
2. 组织解析的复杂化	82
3. 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93

第三章 组织方式与基本推论要素

一、组织内的个体行为特征: 决策	99
1. 行动者出场的逻辑	99
2. 相关的经验研究	104
案例 1: 生产流水线工人的行为方式	104
案例 2: 会计事务所职员的行为方式	105
案例 3: 古巴导弹危机处理的决策者 行为方式	108
3. 行动者的自由余地	111
二、权力关系: 不确定性领域	117
1. 权力及其来源	117
2. 权力与组织	128
3. 相关的案例: 工业垄断集团生产车间的 权力结构	133
4. 组织结构和游戏规则	140
三、组织的边际: 中继者的概念	144
1. “社会职能”与“环境”	144
2. 相关的案例: 省政府与其环境的关系特征	149
3. 环境对组织的直接影响	156
四、组织的调节: 实际行动体系	160
1. 体系制约的行动	161
2. 行动者创建体系	167

第四章 组织分析的一些思考

一、组织方式的维持	174
1. 组织的潜功能	175
2. 相关的案例：法国式的官僚作风	178
模式的特征	179
模式产生的恶性循环	180
模式的潜功能	181
二、组织中的决定、参与和变化	183
1. 决定如同体系现象	183
2. 参与如同解决问题的方法	186
3. 变化如同一种学习	190

第五章 步入“组织田野”的研究步骤

一、研究者初始阶段的位置及其变换	194
二、探索性调查研究的展开	197
三、问题的解释和假设检验	200

第一章 组织的复杂化与

组织研究的演进

组织的复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加强了人类社会活动对组织的依赖,使组织既是个体实施发展战略的首要条件,又是改变处境可借助的重要力量,从而推动了组织研究的进程。众多的组织研究发现了,个体有组织的行动不是消极被动的,也不是中立的,而是有计算有倾向的。对此,克罗奇耶形象地说,个体不只有一只简单的“手”,还有一颗“心”和一个“头”。这些发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深化组织研究的必要性。本章将通过阐述组织的复杂化与组织研究的演进,向读者提供一个能了解组织社会学在其中成长和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

一、大工业组织的发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工业革命?是什么力量导致了第二次浪潮波及全球? A·托夫勒(A·Toffler)在提出这些问题后解释道:工业革命不是由技术本身的力量推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单单用经济因素同样不能说明工业化的动力,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十分复杂的可变因素。K·普拉尼(K·Polanyi)在研究了19世纪前后资本主义强国发生的一些重大转变之后指出:工业革命是一种人为的现象,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和智力的革命。工业化引起的变化是涉及全社会的现象,具体地说,是政治、经济、宗教、司法、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混合在一起的现象。如果人们将这些方面分割开来分析,就无法理解它们各自的运行方式。^①“我们充其量只能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最能揭示我们的意图和从歪曲隐晦的事物中

^① K·Polanyi, 1983(法文版), *La Grande Transformation, aux origine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de notre temps*, Editions Gallimard;或参阅黄树民等译,1990年(中文版),博蓝尼著《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ZUZHǐ SHÈHUǐXUÉ Yǔ JUÉCÉFÈNXÍ ●

$$W_{\alpha} = \frac{m}{1 + \frac{m}{\alpha}} \frac{1}{\Gamma(\frac{m}{\alpha})} \int_0^{\infty} \frac{1}{t} \exp(-t) \exp(-\frac{m}{\alpha} t^{\frac{1}{\alpha}}) dt, \quad \text{for } \alpha > 0, \quad \text{Chen } [20]$$

工业电气化和工业机械化这两次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从经营方式的演变过程看,后一次变革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工厂生产制度取代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家庭生产制度,前一次变革则是工业技术领域内直接应用科学的结果,是依靠科学技术的新兴工业不断成熟的过程。相比之下,工业电气化时代的组织经营方式更具有理性和创新性。

新兴的工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它的发展将使其取代传统制造业而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管理要素和技术要素成为支持它发展的主要方面,因而对人类自身潜能的开发再度受到重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就预言,知识经济在 21 世纪将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形态,高智力将越来越成为计算机软件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所依靠的主要

2

资本。80年代在美国、德国这样的国家首先出现了传统制造业向一种以智力为基础的服务业演变。

信息生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得企业管理越来越不能依赖一种模式,J·奈斯比特(J·Naisbitt)在其《大趋势》中论述的一个尚未完全成型的美国新社会,以某种方式说,就体现了这个正在经历的过程。^①在奈斯比特看来,虽然美国人仍然认为他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入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而且,他们深感这个转变更具有微妙性,也更具有爆炸性。W·怀特(W·F·Whyte)早在1956年发表的《组织的人》一书中,就已经反映了美国工业社会的新型企业管理方式。事实上,随着发达经济社会中广泛运用高新科技,越来越多的人更需要的是处理信息,而不是生产产品。这个时期的美国就出现了从事技术、管理和服务工作的白领工人在数量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这种发展趋势正如奈斯比特在《全球杂谈》中描绘经济全球化背景时所预示的那样:联系全球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电视、电话、电脑连为一体,将使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

20世纪90年代刚刚到来时,一些敏锐的未来学家就指出,美国社会出现的数字化信息革命将使美国形成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率先提出了兴建“信息高速公路”,而且还以不增加网络贸易的新税种,来促使美国真正掌握率先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优先权。这种优先权的掌握在战略上意味着什么呢?根据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知识经济是基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经济,是指信息科技中软件产业、生命科技产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材料科技产业、新材料科技产业、海洋科技产业和有益于环境的高新科技产业的产值,有可能在世界上全面超过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和纺织传统产业的发展阶段。^②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正在从物质生产转向知识生产。对于企业组织来说,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而且是比银行体系、政治体系或能源体系更普遍的环境因素。由此可以想象,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政治、组织模式、财富增长方式、人际关系风格、思维逻辑以及价值观念都会与先前的经济时代有很大的差异。不过,人们在选择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更有效的交流方式的同时,也多少意识到文化更新

① J·奈斯比特著,梅艳译《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0--11页。

② 转引自李建军“关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哲学思考”文章,载于《新华文摘》1999年第3期,第45页。